

## 四、國史大師錢穆

錢穆（1895-1990）是一位「自學成家」的歷史學家，儒學學者。他是江蘇無錫人，但和香港卻有頗深的因緣。1949年，錢穆遷住香港。不久，他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（1950年改名為新亞書院）院長。1950年，錢穆在香港和一批新儒家學人創辦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——新亞書院，以宏揚國學。1955年，他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。1965年，卸任新亞書院校長。1967年，移居台北，任中國文化書院博士班主任，中央研究院院士。他的弟子冠蓋雲集，如余英時、嚴耕望等人，皆出其門下。著作有《國史大綱》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等八十餘種。錢穆對中國文化是一個有名的溫情主義者，認為國人對國史應具有溫情和敬意。



錢穆

### 中國文化思想特點

#### 知識論

知識論在西方哲學中甚為重要，但亦到康德時始正式成立。在中國，並無所謂知識論，但中國傳統思想對此問題實有一共同的態度。孔子云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人類知識有一限度，人能知有不知，並能知那些屬於不知，此實為一種極重大的知識。正猶行路人知道此路不通，便可不再往前，多走冤枉路。

孔子自稱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天命有所不可知，知天命即是知有不可知。孟子說：「盡心知性，盡性知天。」自己的心可知，人類的性亦屬可知，但天

終是不可知。孟子又說：「莫之為而為者謂之天。」此即認天為不可知。但能走儘可知的路，到盡頭處，前面始是不可知的境界，此即中國人所謂「天人之際」。故中國人態度，貴能盡其在我。

道家思想亦常保留此一不可知。莊子只在「化」上求知，老子只在「象」上求知，象是化之有軌跡可尋者。莊老亦似並不認天為可知。

《中庸》、《易傳》亦同樣保留此一不可知。故《中庸》自「愚夫愚婦與知與能」講起，直到「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」處。《易經》講陰陽，識死生晝夜之道，亦是可知與不可知同時存在。

佛法來中國，其思想態度顯然不同。佛法並不重視天，佛法所求到達之終極境界稱「涅槃」。涅槃究竟是如何一種境界，在中國人想法中，似乎仍屬不可知。天台宗講空、假、中之「一心三觀」，華嚴宗講「理事無礙法界」到「事事無礙法界」，則全屬可知了。禪宗不立文字，語言道斷，心行路絕，只從行中覓悟。天台宗近似《中庸》，華嚴宗近似《易傳》，禪宗則近似《孟子》。此三宗之所以成其為中國佛學者，主要正為其能把佛學中不可知部分抽去了，而多講些在中國人智慧中所認為可知的部分。

宋明理學家雖直承先秦孔孟傳統，但有許多與孔孟之說不相同處。如朱子注《論語》云：「天即理也。」把一理字來替代了天字，正因天不可知理則可知。宋儒又云：「理一分殊。」分殊之理易知，而理之終極到達於一的境界則仍屬不易知。朱子主張「即物窮理」，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」，此一途程仍屬遙遠，因此程朱講「性即理」。而陸王定要講「心即理」，亦是要從更易知而更有把握處去講。

因此，中國在傳統思想下不易產生如西方哲學界所討論的起源論、目的論等種種不易解決的問題。因此，中國傳統思想不易產生如西方般的宗教信仰，更不易接受如馬克思等等歷史命定的哲學。中國孔孟傳統的知天命，正是要人知道，理雖可知而宇宙人生一切事變有不可知。

（錢穆：〈中國傳統思想中幾項共通的特點〉，《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》，頁93-95。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11年。）

### 實踐論

中國人既認此宇宙乃渾然一體，同時又認其是變動不居。既屬變動不居，故宇宙真理乃即在變動中見，而人生真理則應在行為中見。故主學思並進，又主知行合一。中國人所稱道之聖賢及有道之士，及佛門中之高僧大德及祖師們，其主要精神，皆在其信修行證，在從其日常生活之實際經驗中來體悟真理。若如西方所謂哲學家，從純思辨中來探討真理者，在中國不易遇見。因此，在中國並未有純思辨的哲學著作，亦並未有在思想上求系統、求組織。中國思想乃多屬於實際生活內心體驗之一種如實報道，而且多一鱗片爪者。唯其一鱗片爪，故乃盡真盡實。其間唯天台、華嚴兩家，著書立說，比較還帶印度佛學規模；至如禪宗語錄，後人都謂其下開宋明理學家語錄體裁，實亦可謂其上承論孟記言傳統也。

(錢穆：〈中國傳統思想中幾項共通的特點〉，《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》，頁96。台北：蘭臺出版社出版，2011年。)

### 中國政治文化特點

中國傳統政治之主要關鍵，則首在選拔賢能。若使政府之所拔用者，果為社會之賢能，則賢能自能代表道義；代表道義者自能相互和協，而完成政府之目標與職責。否則政府非賢能，其所代表者亦將不盡為道義，其相互間自亦不盡能和協，而政府之職責自亦不能完成。故曰其關鍵在如何選拔賢能也。中國傳統政治，自秦漢以下有地方察舉制，自隋唐以下有科舉考試制，此等法規，皆為政府選拔賢能而設。當知此等法規，上自皇帝，下至民眾，共所遵守。若論法治，則此即法治精神一實例。茲姑舉一小節言之。漢代選舉，已按各地戶口分配選額。在東漢時代，大率二十萬人口得舉一人入政府。故漢代政府官吏，乃普遍選拔，來自全國之各地，絕無偏頗不均之病。此制用意，即在隋唐以下，自由公開競選之科舉制成立，依然各地均有定額，故當時各地考試，有十人取一者，有百人取一者。由其有此法規，故中

國之政府人員，自秦至清，乃大率能平均分配於全國之各區域。

(……)

且政治亦人事之一種。無論其為何種之政制，要不能徒法而自治，必有活人之參加。故做官不能與做人相分離，從政不能與為人相隔絕。此亦極淺顯之事理，而仍為今日一般國人所不瞭。若謂其新法制便可有新政治，有新政治便可有新人生，則人生依法制為轉移，豈不直捷易簡？而惜乎其不如是之可以企而及也。就實言之，政治乃從全部人生來，法制乃從全部政治來。若此理而信，則將來中國新政治之新生命，端將在其整個社會之做人道理中重獲健康，而並不在於向外邦異國抄襲其法律制度以為紙上之粉飾。而其整個社會之做人道理，則仍必與其傳統精神與文化特性有不可解脫之關係，此固無從模倣抄襲而有之。他日者，政治新生命一朝煥發，則一切新法制亦有所附麗而顯其用，而物質經濟亦有所寄託而植其根，而後科學事業乃可迎頭趕上，以儘量吸收他人之所長。故竊謂晚近百年來中國新思想新潮流之四階段，其最值商討者，乃在第三階段；乃在其主張全盤西化，而以政治與科學等量齊觀之一點。

(錢穆：〈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〉，《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》，頁222-226。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11年。)

### 文化衝突和調和

中古時期以前的一切，我們也不必多講。總之我們可以證明西方文化確實衝突性很強。一兩百年來，西方文化傳佈到全世界，我們中國也接受了，遂在此全世界乃至我們中國，平地添出許多衝突。我們則就在此衝突中間過日子。專從中國講，就有兩種大衝突：

第一：是「內外」衝突。中國人都看不起內部自己，而要看重外洋。

第二：是「新舊」衝突。舊的是我們自己，新的就是外國。今天我們是看不起舊的，只要新的。

我們這一百幾十年來，就永遠在這衝突狀態之下。

我們這個社會，在這一百多年來，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不斷地發生了衝突，這暫不講。更不好的，是我們認錯了，以為西方文化長處正是在能衝突，不知衝突只是西方文化中一短處。也並不是說文化中不能有衝突，但衝突總要求「調和」。而西方文化中衝突力量過強，調和力量太弱；而我們現代中國人，則似乎就要來羨慕人家這許多衝突。自己沒有衝突，要來製造衝突。即如西方有「文藝復興」，這是西方歷史在人生上一個大衝突，我們現代的學者如梁任公，便說，中國也該來一個文藝復興才好。但西方的文藝復興，是他們在中古時期的教堂內讀到古書，發現了從前的希臘、羅馬而起。中國則五千年來還是一個中國。中國講孔子，兩千五百年來還是一孔子。孔子講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亦已兩千五百年到今天。在中國歷史上，既無一中古時期，又到哪裏去找一個文藝復興。

我們既無文藝復興，便硬要說我們只在中古時期中，又說我們仍只是一個「封建社會」，該打倒。但中國的封建是在春秋以前，秦以後中國統一，沒有封建了。孫中山先生只講過當時許多軍閥有「封建頭腦」，是說他們不懂社會已變，時代不同，而他們還想割據。中山先生只是這樣講，並沒有講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。

中國封建社會早沒有了，而還要來打倒。而且諸位看中國歷史，我們在什麼時代纔打倒了封建的呢？其實也沒有。中國的封建，在調和中而不存在。今天我們要打倒封建，兒子違抗父母，即說你是封建，這一衝突，卻深入到我們每一家庭裏。甚至我們政府來台灣，台灣受了日本統治五十年，當前這二十多年，重回祖國懷抱，那是何等可慶幸的事，但是我們少數台灣青年跑到美國、日本，便來提倡台灣獨立，這不又是在無衝突中要來製造衝突嗎？

我今天要特別提出講的，就是我們這一百年來，太過羨慕西方文化。西方文化不斷有衝突，在衝突中表現出一股力量，這個力量是可怕的。回過頭來看自己，好像無精打采，有氣無力的，怎麼老不會衝突，遂誤謂中國文化

的缺點就在這裏。乃要在無衝突中製造衝突。不知中國文化之偉大處，乃在能「調和」。

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，不能老關着門，該要開門接受外面的一切。尤其是今天科學發達，我們關不起門來。目前大陸還想關門，我們並不想關門。多方文化接觸，外面新的東西進來，我們該吸收；當然有些舊的也可排斥。但在這「吸收新的」和「排斥舊的」中間，要有一「調和」。若要把全部舊的一齊排掉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（錢穆：〈文化傳統中的衝突和調和〉，《中國文化精神》，頁 56-58。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11年。）



## 中國文化復興

但我們又該怎樣的復興法呢？我想我們首先要弄清楚，復興文化不是一個理論，也不是一個知識，乃是我們一種「行動」。這種行動，是我們自己的，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。所以要復興文化，不僅要有「信心」，第二還要有「決心」。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，既是一個事實，一個行動，也不是在看別人行動，乃要我們自己行動，那麼就該從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上開始。諸位說：我一個人決心要復興文化有什麼用？但不知，大家都是一個人，大家都有一條心，復興文化是大家的事，是每一人的事，就得從我們每一人開始。明末顧亭林先生說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」那時的中國人，經受到的艱難危險，或許比我們今天要大得多。滿洲人跑進中國，中國整個亡了，而顧亭林先生說，一個國家的興亡是小事，天下興亡纔是大事。他所說的國家，乃指政府的政權；他所說的天下，乃是我們的民族與文化。「民族文化」的興亡，我們每一人，匹夫匹婦，大家有責任。「興」的責任在你。「亡」的責任也在你。我們今天又要來用到這句話。

今天要來復興文化，該從我們每一人下決心做起。大家是一人。大家有一心。從一人可以影響其他人，人心可以散佈開去，亦可以凝聚團結起來。

心的凝聚與團結，就成為一種「時代精神」，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。力量其大無比，無法用一個物質上的數字來計算來衡量。說台灣有多少人，大陸有多少人？台灣地方多少大，大陸地方有多少大？這些只是一種虛偽的唯物論。我們要從「人心」之能凝聚團結，連把歷史上的心也凝聚團結，發生一種最大的力量。或許地面愈小，人口愈少，凝聚團結便愈容易。譬如一盆火，盆子小，容易旺。盆子大，火就難發，又燒不旺。從歷史上看，我們幾次到了極危險艱難的時候，每從一個小地方發生出新力量。這個力量，並不是在全國各地同時發起，只在一個地方發起，而每易在小地方發起。諸位是軍人，國民革命軍北伐，還不是從廣州黃埔一個小地方發起的嗎？大家集中到一個小地方，地面小，人口少，而這力量卻發生了。今天的台灣，天造地設是一個孤島，正是我們復興文化的一理想基地。只要我們下決心。

我們從另一方面講，近代的中國人正為沒有了文化的自信心，而陷入了這個艱難危險的深坑裏邊去。在清末，我們想學日本，想學德國。後來我們想學英國、法國。再後來想學美國。而中共則想學蘇維埃。正為我們失掉了自信，所以只想模仿抄襲學別人。今天已經走絕了路，或許我們還有一般人，還沒有徹底覺悟，認為我們學美國，可以戰勝了他們學蘇維埃，沒有懂得「反而求諸己」。但目前實已到了各路都斷了，無路可通，只有回過頭來學自己。「復興文化」纔是救中國，使我們再做一中國人的唯一可行之路。我們在這樣情形下，該下一決心。其實決心就是信心，有了信心，開始實踐，一步踏上，就是決心。

於是第三，我們再要有一個「堅定心」。不轉不退，不搖不惑，前面只有此一條路。《大學》上說：「知止而後能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我們要能定、能靜、能安，纔能來考慮一切問題，使自己聰明顯露發越，而後始能有得。最先便是要「知止」。我們這一百年來，平心而論，哪一個不愛國，哪一個不奮鬥。可是到今天，一無所得，正為我們不懂得知止。中國人就是中國人，這是我們一個大本根，離此本根去學外面，忽此忽彼，這心沒有一天定下，沒有一天靜着安着來考慮，那樣如

何能有得？一切事實，我們該先懂得要站定在一點上，不能搖動。坐也坐在這上，跑也要從這一步跑起，跳也要從這一點跳起。今天就要我們在「文化復興」這四個字停下。下面千變萬化，驚風駭浪，不斷地來，我們心先定下來了，靜靜地，安安地，來考慮應付，這樣纔能有所得，所以我們又要有一個堅定心。

再進一步講，第四，我們要有個「誠心」。誠是要「內外合一」。外邊的言與行，要和內面的心相合一，誠又要「始終合一」。開始這樣，最後還是這樣。我們這一百年來，全國人心，彼此不合一，始終不合一。雖說是大家為愛國，要救國，表現出來實像是心不誠。一路翻滾，一路衝突，像是在自搗亂。我們該要同心合力貫徹始終。特別重要的，在要使我們的「心」和「理」合一，我們纔能內外合一，前後合一。所以中國古人講一「誠」字，同時又要講一「明」字。但有了誠心，纔能慢慢兒到達一個明。明白了，也纔能慢慢兒到達一個誠。在我們所謂誠的中間，有一種「明慧」和「理智」的成份。不是說純感情，或純意志的。我們要有一個明慧與理智在裏邊，纔能「立誠」。

（錢穆：〈復興文化之心理條件〉，《中國文化精神》，頁227-231。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11年。）

## 世界問題和中國文化

歸結言之，世界問題其實只是一「人生問題」。人生應分兩方面：一是「物質人生」，即經濟的人生；一是「精神人生」，即心靈的人生。亦可謂兩事屬一事，但仍不妨分兩面看。最應知者，物質方面易變，而心靈方面則不易變。由於氣候相異，物產不同，引生出各地居民間各種區別。自然影響與歷史積累，久之而形成各不同的民族。民族形成之主要因素，偏在心靈一面，不在物質一面。如宗教，如文學藝術，更要在其內在之性格、愛好，與娛樂方面之情感意向，顯然互有不同，很難融合合一。縱使在同一物質人生下，亦驟難泯滅其心靈人生方面之鴻溝。



如非洲黑人到美國，已有兩三百年的歷史，但依然有黑白距離。此下縱在法律上、教育上力求調和平等，恐此一距離終不易消失。中國人在南洋僑居，為時亦越兩三百年，但馬來人、印尼人與中國人中間之界線，仍然存在。

近代西方人，過分看重了物質人生，看輕了心靈人生。他們把物質生活來作衡量人生之標準，而高自位置，養成一種民族自傲心理。不知物質經濟上之優越條件，並不能來領導人生乃至支配人生。在人類精神心靈生活方面，唯一正道，乃求各自獲得其個性之發展。每一人各有個性，每一民族亦然。尊重個性，對每一人每一民族，務求各自獲得其高度圓滿之發展；而在個性發展中，乃有其相互間之融通協調；此始為人類邁向世界大同一條唯一的正道與坦途。

中國古人，早抱此一種理想，而提出一「仁」字來。「仁」是一種人與人相處之道。但雙方必各自保有其個性。其人沒有個性，決不能是一仁人。不知尊重對方他人個性，也決不能是一仁人。故真是一仁人，必會尊重自己個性，也同時尊重對方他人個性。孔子曰：「為富不仁。」若太過專重於在物質生活方面着想、打算，則必然會忽略了對方他人個性，而連帶忽略了自己內在個性。總之是為了物質人生而損害了心靈人生。而人生正道則必然要以心靈人生為主，物質人生為副。今天世界人類，乃反其道而行。中國古人所謂「以心為形役」，正可為今天世界人類生活寫照。這是今天世界人類一切糾紛一切禍難之總病根。

（錢穆：〈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〉，《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》，頁 48-49。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11 年。）

### 中國文化對人類的貢獻

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，在於對「天」「人」關係的研究。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。我曾說「天人合一」論，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。

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，便是有關「天」的問題。我曾讀過幾本西方歐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，真不知從何講起，西方人喜歡把「天」與「人」離開分別來講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。這一觀念的發展，在今天，科學愈發達，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。

中國人是把「天」與「人」和合起來看。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，離開人生，也就無從來講天命。離開天命，也就無從來講人生。所以中國古人認為「人生」與「天命」最高貴最偉大處，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。離開了人，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。所以中國古人，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。違背了天命，即無人文可言。「天命」「人生」和合為一，這一觀念，中國古人早有認識。我以為「天人合一」觀，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。

西方人常把「天命」與「人生」劃分為二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，顯然是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，兩次場面來講。如此乃是天命，如此乃是人生。「天命」與「人生」分別各有所歸。此一觀念影響所及，則天命不知其所命，人生亦不知其所生，兩截分開，便各失卻其本義。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「天人合一」論，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。

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，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。而中國文化，既認為天命、人生同歸一貫，並不再有分別，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，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。在中國思想中，天、人兩者間，並無「隱」「現」分別。除卻人生，你又何處來講天命。這種觀念，除中國古人外，亦為全世界其他人類所少有。

（錢穆：〈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〉，《世界局勢和中國文化》，頁 376-378。台北：蘭臺出版社，2011 年。）

### 問題討論

1.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思想有什麼特點？
2. 你對中國文化復興的前景有何看法？
3. 你認為中國文化對世界局勢能作出什麼貢獻？